

美国的战略收缩提供了中国新机遇

陈东林

摘要：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总体上采取收缩战略，把重点放到国内经济建设，给中国留下了国际空间。中国可以灵活地把握策略，一定程度地以退为进，比如萨德入韩问题。这无论对中国的国际发展还是世界和平，都是有利的。再比如，通过在贸易上向美国做一些让步，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干涉，从而形成和平统一台湾的局面。

我是研究当代历史的，为什么选这么一个题目？第一，今年的2月28日，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。对这个历史大家应该有一些新的反思。第二，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已经45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什么样的？如何找到中国的出路？我个人觉得借鉴一下45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交往的历史经验，是很有启发的。

在此之前，我先说两点看法。第一点，从历史上看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模式能否成功，主要不取决于改革，而取决于开放。50年代中国「一边倒」地倒向苏联的时候，我们是传统计划经济。到了60年代中国「反帝必反修」，和美国、苏联都闹翻的时候，我们处于人民公社的晚期，搞封闭的自然经济。80年代对外开放以后，中国才逐渐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像朝鲜，不对外开放，内部改革是搞不起来的。一开放，改革该怎么搞，就是水到渠成了。当前我们主要的国际经济战略是「一带一路」，而「一带一路」能不能成功，关键就在美国。原来我对「一带一路」实施并不太乐观，觉得比较困难，因为美国在全球那么大的军事力量，能够迫使其他国家不敢赞成你。为什么中国的高铁、桥梁、管道、水库技术和价格在世界上都极具竞争优势，而对外合作却比较艰难？像在泰国、缅甸、印尼，还有刚果（金），谈判都是反反复复。原因就在于此。

现在，特朗普上台以后，要收缩，把重点放在美国国内。中国继续发展的机遇就出来了，就是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。

第二点，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，比如司法独立的问题，没有人提，似乎比以前更后退。我认为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，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举世瞩目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急躁推动，暂时不要动它，保持社会稳定，把经济搞上去，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其他的健全民主法制问题、防止腐败问题，暂时有些损失，是可以承受的代价。这也是亚洲国家的一个传统发展模式。亚洲四小龙都是在集权时代快速发展起来的。像韩国，从全斗焕到卢泰愚都是军人政权，等韩国的经济发展起来，民主的问题自然就水到渠成，而且代价小。新加坡、印尼、台湾地区，也是这样，用集权体制保持社会稳定，强力推动经济起飞。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地区差异那么大，搞得像现在韩国青瓦台那样，动不动就百万人日夜游行，那样真的好吗？我认为，现在中国最合适的政治体制，就是精英政治。精英经过社会调研以后，在内部畅所欲言，为领导建言。如果要套用邓小平当年那句通俗的话讲，就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。只要最高领导人能够认真听取精英们的意见，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决策，我觉得就是当前合适的机制。不要去搞街头拉票和竞选，中国承受不起那样剧烈的社会震荡。

回到本题，我们用今天来对比毛泽东、尼克松时期的特点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也许新的世界格局，中国新的发展路径，就在旧历史的螺旋上升之中。

一、中美两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比较。

1969 年美国共和党尼克松当选总统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窘：

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，无法自拔，从出人出钱出武器到直接派遣几十万美军参战，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，包括化学武器的所有手段，美军伤亡十几万人，仍然不能使越南南方战争结束。这也导致了美国和世界反战斗争风起云涌。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，极力想找到一个「体面地」从越南战争脱身的方式。而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坚强后盾——中国打交道，是不可避免的了。经济方面，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历了二战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。1944 年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—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，促进了战

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但因这时期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，该体系于 1971 年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。

当今美国的处境，和那个时期非常相似：美国在推行「颜色革命」和「反恐怖」战争中，花费了 6 万亿美元，牺牲了 5000 多士兵，却看不到结局，伊拉克、叙利亚仍然在战乱之中，恐怖袭击在美国和欧洲仍然时有发生。美国的经济的发展，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中国，背上了 20 万亿美元沉重债务。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：「我们在海外倾尽所有，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，陈腐破败。我们助他国致富，而我国的财富、力量和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。工厂一个个关停，搬往他处，上千万美国工人被丢在脑后。财富从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手中流逝，却被分配到了世界各地。」

再来对比中国的两个时期。「文化大革命」初期的 1967 年，极左势力煽动外交部夺权和冲击英国驻华大使馆等一系列造反浪潮，使中国与许多国家发生了恶性外交事件，与一些国家的关系甚至到了断交程度。1969 年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，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分裂。中国处于四面受敌、闭关锁国状态。正如 196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所说：我们孤立了，没有人理我们。1971 年 9 月发生的林彪出逃事件，又宣告了「文化大革命」极左路线的失败。从林彪事件开始，毛泽东逐步总结教训，纠正了一些极左的错误。在外交方面，他试图找到一条联合国际力量结成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道路。「三个世界」理论开始在他脑中初步酝酿。

当今的中国，也面临着国际战略转折时期。在 1989 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以后，世界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了低潮。邓小平审时度势，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定下了四个字：「韬光养晦」。经过 20 多年的悄悄发展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军事力量和外交地位得到空前提高。如何在世界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战略，也面临着一个抉择。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，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」，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，也是习近平主持报告起草工作时明确主张写进去的。从国际发展环境看，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，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，新的均衡尚未形成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国际战略，已经到了把「韬光养晦」那四个字，改变为「奋发有为」的时候。中国将积极主动承担起更大的民族责任和大国责任。

二、两个时期左和右的力量都在寻找共同点，趋向务实。

1969 年尼克松刚刚就职总统，就说：有生之年的希望，就是访问中国。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回应，在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：欢迎尼克松来访问，公开来也可以，秘密来也可以。谈得拢可以，谈不拢也可以。经过基辛格秘密访华，尼克松访华实现了右派对左派的访问。1972 年 2 月 21 日，毛泽东和尼克松进行了富有哲理的谈话。毛泽东说：你当选，我是投了一票的。尼克松也幽默地回答：我想主席投我一票，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。毛泽东说：我是喜欢右派的。人家说你们是右派，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。我喜欢右派，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。尼克松说：我想重要的是，在美国，至少现在，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。毛泽东点头同意。双方还暂时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，坐下来谈解决问题的实事。毛泽东说：我们两个国家有时候需要放放空炮，我们要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！你们要说共产主义去你的吧！毛泽东还以做自我批评的方式批判「文革」极左错误说：你们要在两国之间搞些小贸易，我们就死也不肯。最后发现还是你们对，于是就打乒乓球（搞「乒乓外交」）。

共和党在美国被认为是右派，而特朗普更被认为是右派中的极右派。他上台以后，尽管语言张狂，举止变化不定。但他以批评奥巴马政策方式，承认当前美国存在的严重政治、经济问题，是比较正视现实的。他提出的「重建美国」目标和寻求解决办法，甚至具体到了修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墙的预算，也是比较务实的。

三、「一条线、一大片」和「一带一路」地域战略的比较。

提出「一条线」、「一大片」的背景是，1970 年代初，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，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，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。毛泽东认为，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，不能两面作战。由此，他在 1973 年 2 月 17 日会见基辛格和 1974 年 1 月 5 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了「一条线」及「一大片」的构想：将从中国、日本经巴基斯坦、伊朗、土耳其、欧洲到美国一线，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，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。1974 年 2 月 22 日，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说：「我看美国、苏联是第一世界。中间派，日本、欧洲、加拿大，是

第二世界。咱们是第三世界」。「亚洲除了日本，都是第三世界。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。」

今天，中国提出的「一带一路」的国际发展道路：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，联合中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、俄罗斯、中非等 20 多个国家，直到欧洲。和当年「一条线一大片」战略的地域取向也是基本一致的。虽然中国提出「一带一路」不排斥任何国家，但明显使两个国家感觉失落，就是美国和日本。这是中国出于安全的考虑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「一带一路」和当年的「一条线一大片」，都是一场战争，只不过由准备军事战争变成了进行经济战争。同时，中国实施这一战略并不是采用备战手段，而是通过对外投资，扩大对「一带一路」经济带国家的建设，增进贸易，取得共同经济发展。是和平、开放的，这是和当年完全不同的。

四、两个时期的比较对当前的启示：

1、特朗普上台后，美国总体上采取收缩战略，把重点放到国内经济建设，给中国留下了国际空间。比如：实施严格的美国移民政策，筹划修建美墨边境墙，宣布退出 TPP，要求北约、日本、韩国等负担更多的军费和防御开支，都是收缩的表现。虽然，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也有挑衅「一个中国」原则，继续扩大军费开支，叫嚣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的言论。但事实上，美国既要扩大国内投资，又要继续扩军备战，在 20 万亿债台高筑情况下，是无法解脱这一矛盾的。我认为，收缩国际空间是真，继续扩军备战只是虚张声势，是要面子的烟幕弹。

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，中国可以灵活地把握策略，一定程度地以退为进，而不必步步紧逼，咄咄逼人。比如萨德入韩问题。这无论对中国的国际发展还是世界和平，都是有利的。

2、采用灵活的外交手段，促成和平统一台湾的局势。回顾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，在台湾问题上也作了较大的让步。美国当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和台湾保持「外交关系」，毛泽东就果断决定欢迎美国总统访问中国，而且给予高规格接待。在访问时期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中，毛泽东也决定，在某些步骤上让步，同意美国不与台湾立即「断交」，逐步从台湾撤军和继续军售。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谈判汇报时，听到美国说不肯公开表态放弃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，说是不能抛弃老朋友。毛泽东诙谐地说：猴

子变人要有个过程，还留着一条尾巴。毛泽东还说：我们请尼克松来，不能就为自己，台湾没有打仗，越南在打仗死人。我们要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，台湾问题可以让一些步。

这个灵活的策略，在今天值得我们借鉴。比如，通过在贸易上向美国做一些让步，换取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干涉，从而形成和平统一台湾的局面。

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，2016 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5785.9 亿美元，美方贸易逆差 3470.4 亿美元。中国取得很大贸易顺差，这是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，也得益于特朗普上台以前，美国不重视贸易平衡。特朗普上台以后，中国要继续保持巨大顺差，是比较困难的。不妨向美国作出一些让步，降低进口关税，承诺进口较多的美国商品，要求美国放宽高端产品、技术对中国出口的限制，从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。特别是中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，对钢铁、机电、化工产业等本来就是要实施「三去一降」的供给侧产业结构改革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）